

“春柳社”之前的上海新剧

朱恒夫

《戏剧艺术》

—

内容提要：在“春柳社”之前，新剧已在上海存在了几十年。演出者为欧美等国在上海的侨民组织的业余剧团 A. D. C.，欧美、日本等国来华旅行演出的职业剧团以及上海的教会学校。演出的剧目为《阴谋与爱情》等数十个。上海的中英文报纸经常登载新剧的信息，如演出海报、演员活动、国外剧作家介绍、戏剧评论等。旅行欧美、日本的华人在回国后所着的游记中，亦介绍国外的戏剧状况，这些都会对中国人自己演出新剧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十九世纪上海新剧

研究中国话剧史的人，都将“春柳社”的张帜之时，即 1907 年，作为中国话剧的发端。其实，“春柳社”的话剧已经相当的成熟，他们演出时，从东京到上海，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在此之前，话剧实际上已经在中国尤其在欧美文化弥漫的上海涓涓缕缕地存在着了。笔者检索了上海一百多年前的报纸、杂志以及有关上海的笔记，爬罗出一些材料，作一些梳理，希图将“春柳社”之前的上海新剧，作一个粗略的勾勒，对中国话剧史或许有所补阙。

一、外国剧团来沪演出与名

剧介绍

由上海字林洋行主办的第一份华文报纸《上海新报》1867 年 3 月 19 日第 2 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

摩拿轮船与亚克美米兰轮船行离新加坡不远，两船相撞，摩拿轮船大受损伤。该船上载有外国戏班，即前在上海“满庭芳”演戏之班也，内有一小梨园将腿碰断，可惨也。

“满庭芳”是剧院名，是上海第一家京戏园，也是租界内第一家中国戏园。位于石路（今福建中路近广东路一段），英籍华人罗逸卿仿京式茶园建造。该剧院能容纳观众三四百人，在该戏园经常演出的是中国戏曲。“外国戏班”在此演出，当然演的是外国戏。

一个外国戏班，不论是欧洲的国家还是美国，万里迢迢，漂洋过海到沪演出，就绝对不会只演一天两天，可能长达一两个月都有可能。其观众因为语言与欣赏习惯的关系，自然多是租界内的外国人，但是在浸漫于欧美文化并有崇洋倾向的上海，也肯定有中国人，如洋行的买办，他们不存在语言的问题，因为工作的需要，他们也愿意更多地接受西方的文化。也有思想开明的中国读书人，他们可能带着看新鲜的心理到戏园中看外国戏班的演出的。但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外国的戏剧都会对上海的文化生活产生影响。

清末著名文人王韬即是其中之一，他在《瀛壖杂志》卷六中说：

西人工为戏剧，如纵跃飞舞，皆以女子为之，短裙窄袖，袒胸及肩，衣裾四周，悉缀宝珠，雪肤花貌，掩映于明灯之下，与烛光相激射。台下奏乐者十余人，抑扬嘹亮，皆西国之乐器也。女子步武疾徐，悉中音节。……演剧时出山河宫阙，悉以画图，遥望之几于逼真，凡此戏术，皆从海外来，偶至一演，非时有也，特价甚昂，非如关帝之看西施，仅舍一金钱已也。其他寻常游戏亦有可观，如电气之器能令暗中发光，以数十人连环携手执之，无不震缩，又影戏皆以玻璃片画戏，而亦能变化无端，西人于宴客时酒阑茶罢，率一为之，以供笑乐。[1]

由于当时的上海是一个经济繁荣、贸易发达的自由港与亚洲的第一大都市，吸引了许多外国艺术团体来沪作营业性的演出，如《申报》同治壬申（公元 1872 年）四、五月间的报纸常登载着一幅外国马戏班的广告，如四月二十四日的广告是这样的：

外国男女马戏赠物

今有西国新到上好男女马戏一班，能于马上变幻百出，跳跃飞腾，并有多方奇巧，特欲中国人赏鉴，准于礼拜六夜九点钟开演，头等客位坐取洋一元……务请诸君共来观看，幸勿自误，本园在江西路锦名洋行对门便是。四月念三日，外国戏园主人谨启。

马戏班能来沪，演剧的戏班当然也能来沪，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时兰心剧院就经常有外国剧团的演出，这在后文中有介绍。每一个戏班的每一次的演出都会对上海的演剧艺术产生冲击波，只是有强弱之分而已。

除了外国的戏班来沪演出，让中国人直接接触到西欧的戏剧之外，报纸还介绍西方戏剧家与戏剧作品。如刊于《上海新报》1867 年 6 月 6 日第 1 版的一

篇文章说：

按演戏一事，凡有文艺之邦，自古皆有之，其中演戏者亦有才子之名。查英国书籍内，有顶出名者，名舍记士比耳。所演之戏，曲文既佳，做法亦妙，且系大忠大义，皆英国有学问人读过之书也。不但古往大事，能以演出，即平日之风俗亦可以演，以教化人心。其人生于 1564 年，幼时因家贫未能多读书，幸天资颖悟，自能讲求至本国之书与法国之书、以大利国之书皆精。惜其人之父太贫耳，十八岁后完姻，所娶之妇长伊八岁。初学戏时，常扮无关紧要之人，未得出人头地。舍记士比耳以为戏之妙处不在依样葫芦，须独出心裁，方可惊人之目，故后来演戏，胜似前人。

昔看戏者之中有体面者俱不以下等人视之，况国中大有名望之人，皆乐与交好，助以银钱。嗣有皇后名意里撒白最爱观之戏，且出题目，令伊照题而演。由是其名大振，因此致富矣。但其人最爱清静，三十四岁在本乡买一清幽之处，欲谢世界繁华，希图安逸，至四十岁遂向所买之处而居焉。五十岁即辞世矣。然在当时伊之全好处，人尚未尽知，数世后有学问之人无不全知其妙处也，即读书人亦追念此人。窃意华人能读英国本文者定爱读其诗句，但诗句之佳不能译出，仅能就诗中大意译出来，如小说者然，想华人定爱诵念，下次陆续印出可也。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介绍莎士比亚，文章虽短，但莎氏的生平、成就、影响都论及到了，尤其是莎氏的戏剧观、英国演员的社会地位的介绍，一定对中国的剧坛产生良好的影响。之后《上海新报》连续数次连载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丹国王名涵利德故事》。在连载结束之时，该报又评论道：

这段大故事今已完毕，想华人看之，有云同中国演戏一样，有云同中国小说一样。总之中外事情，外面或有不同，而论事大略则同，但看此书，须知此事系一千年前之事，比之近今人事风俗大不及，今日明白者多也。本馆将此事陆续印出，非劝人看戏，何也？戏有好亦有坏，既看好戏，即要看坏戏，故本馆译此，不过欲增人见识而已。

报馆的目的是增人见识，然客观上让中国戏剧界知道了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叫莎士比亚，他的代表作品是《哈姆雷特》，还能从这样的介绍中了解到外国人的戏剧观，即戏剧须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与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

据中国早期话剧的创始者徐半梅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介绍道，日本

常有话剧团到中国来演出：

我还发现一处日本的小型剧场，在虹口文路。这是把一座中国式三上三下的房屋，将楼面改造成剧场，连天井也消灭在内，居然这小剧场也可以容二百人光景。这剧场常有新派剧团开演，都是从日本来的旅行剧团。每一剧团大约演一个月光景，辍演后，又有第二个剧团来演，一年到头，总是川流不息的演出。我便常常在看，成了一个老主顾了。……它与日本都市中的剧场，情形不同，日本的剧场，往往一出戏要演一个月光景，而东京席为了看客有限，每天必定换戏。……那时旅行剧团相当有趣，他们往往一团只有十一、二人；但其中多数的伶人，都是一个人可以兼演好几种角色，某伶今天扮生，明天扮旦，后天又扮老旦了。而且他们人数虽少，什么戏都可以演。他们会把世界名剧，也都搬上这小小舞台上，因为他们往往会将一部巨着缩成短小而完整的东西，所以虽然只有十一、二人，竟可以演数十人大场面的戏。[2]

由上引的材料来看，日本剧团在上海演出的“新派剧”，是常演不辍的，剧目常换，且演世界名剧。虽然演技并不高超，但它的表现形式却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戏曲，它成了中国人了解话剧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日本人办的小型剧场创办于何时，已不可考，它的观众主要是日本侨民，但也有一部分象徐半梅这样的中国人经常去看戏。

二、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与教会学校所演出的新剧

现在许多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所依据的大都是徐半梅的《话剧创始时期回忆录》，该书在第三节“无人参考的参考品”中先介绍了1900年前后，在上海租界内博物院路，有一所外国人经营的兰心戏院。其剧场完全是欧式的剧场，“前后台都很宽大，客座是三层楼。尤其是声浪，真令人满意。如果一个演员在台上微啭一声，这极微细的声音，竟可以送达到三层楼上。”

上海还有一个外国人的业余剧团，简称A. D. C.，团员都是旅沪侨民，他们每年必定演剧三四次，每次演期，大概总是三天光景，全是夜场。而这A. D. C.与兰心，有很密切的关系。A. D. C.每次演剧的戏单上，总把历年来演过的戏名，一一附印着，而且还有开演日期。在四十几年前，我看那戏单时，已晓得它有四五十次的演出历史了。所演的也都是世界有名的剧本，当然有相当成绩。……（中国人）即使偶然有好奇之人，去欣赏一下，除惊叹布

景的逼真外，对于戏剧本身，总觉索然无味。假使当时有一部分人对于这剧团能加以注意，以它作参考品，那说不定中国的话剧，可以早十年产生哩。然而也并非绝对没有中国的知音者踏进这所剧院，极少数有志于戏剧的人，倒是常去领教的，笔者就是其中的一个。[3]

徐半梅所说的这个剧团有着五六十年的历史。1840 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的西方侨民很多，为了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组织了两个业余剧社——浪子剧社与好汉剧社。用货栈搭起临时舞台，来演西方的名剧。1866 年，浪子、好汉剧社合并扩充，组成了上海戏剧爱好者俱乐部

(Amateur Dramatic Club of Shanghai)，简称 A. D. C.，在这前后，租界内盖起了一个正规的剧场，名叫兰心剧院。

A. D. C. 剧团的台柱之一是上海最早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的主笔李德尔，他是英侨中的首要人物，人们称他为“巴柏叔”，曾做过电力公司的秘书，后又任工部局的总董。寻着这条线索，我们查找了《字林西报》中有关 A. D. C. 剧团与兰心剧院的报道。

A. D. C. 剧团的活动在《字林西报》中常有报道。如 1867 年 1 月 21 日第三版上登载了剧团的一名负责人写给《北华日报》主编的信，信中希望居住在上海的英国与美国的女士们参加到剧团中里来，“我敢肯定如果我们的女士们加入到戏剧社的队伍中，她们潜在的隐藏的巨大的戏剧和舞蹈才能将被挖掘出来。即使有些女士的声音和气质不适合出演滑稽剧、笑剧、荒诞剧中的角色，她们也可以通过舞蹈来娱乐大众。剧团需要 6 到 8 个女演员排演一个芭蕾舞剧。”据报上的广告得知，他们演过《水手之家》、《巴黎来回五美元》、《驯服逃婚者》、《愉快的流浪者》、《伸出援助之手》、《水往低处流》等等，以喜剧居多。

A. D. C. 剧团基本上是在兰心剧院演出的，当然，在该剧院演出的决不止 A. D. C. 剧团一家，据《字林西报》报首，1868 年 7 月至 9 月份，在兰心剧院演出的有澳大利亚戏剧公司，他们上演的剧目有《妒妇》、《年轻的寡妇》，还有玛丽剧团，他们上演的剧目有《一张图片》、《温柔的原始人》、《阴谋与爱情》、《女仆与喜鹊》、《我们的美国侄儿》等等。

A. D. C. 剧团是外国人办的，虽然属于业余性质，但由于他们对于话剧艺术比较熟悉，说不定其中的个别人还是演员出身，我想其演出的水准尽管赶

不上专业剧团，但其表现方式则绝对是西方的，或话剧的，或歌剧的，或舞剧的。兰心剧院由于一年中有数十次的演出活动，因此，去该剧院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外国侨民多，但一年中去的人次可能也不会少。正如徐半梅所说，象他这样去看戏的人还是有的，既然有，就一定会对上海的演剧艺术产生影响。

在上海演出新剧的除了 A. D. C. 剧团、外国来华的职业剧团之外，还有教会办的学校。19 世纪中叶之后，教会开始兴办学校，在中国培养传教士与信徒。仅在上海一地的教会学生即有数千人之多。圣约翰书院与徐汇公学，都是早期的教会学校。学校为了寓教于乐，使教学更有成效，经常将圣经中的故事排演成戏剧，有时也演世界名剧。1898 年的圣诞节，即 12 月 25 日，中国农历的 11 月份，圣约翰书院就有演出活动：“己亥冬十一月，约翰书院学生，于耶苏诞日，节取西哲之嘉言懿行，出之粉墨，为救主复活之纪念。”[4] 1898 年的圣诞节，圣约翰书院上演了两个剧目，一是英语剧，一是反映中国官场生活的《官场丑史》，1900 年，南洋公学中院二班演出了新剧《六君子》，由于反映时事，吸引了很多师生，他们自带蜡烛，把演出所在的教室照得通明。演出的效果出于编演者意料之外，受此鼓舞，他们又编排了一出新剧《义和拳》。

同年，上海育才学堂以八国联军进京和江西教案的事件为素材，编写成剧本，演出时，恰好是举国为庚子事变震惊，因此，反应特别强烈。1902 年，徐汇公学根据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编演了五幕法语剧《脱难记》。

1903 年，南洋公学又演出了《张汶祥刺马》、《英兵掳去叶名琛》、《张廷标被难》、《监生一班》。其中《张汶祥刺马》不但轰动当时，且成为后来各种表演艺术形式改编的蓝本。

1905 年年底，新剧的爱好者汪优游联合了几个学校的同志，成立了一个业余演剧组织——文友会，使新剧走出校园，让市民观赏。第二年的元宵节，文友会在画锦牌坊陈氏的私人宅院里举行公演，剧目有《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和一出即兴编成的时装滑稽闹剧。

1906 年，新剧演出不断，剧社接二连三地出现，闻名一时的有上海沪学会演剧部、上海群学会演剧部、上海学生会演剧部、上海青年会演剧部、开明演剧会等。

这些多在校园内演出的新剧，对我国话剧的孕育有着极大的帮助，它们培

养了新剧的爱好者与活动家，如被誉为“实开今日各剧社之先声”的汪优游之所以能投身于新剧活动，就是从看了新剧《官场丑史》后开始的，“这种穿时装的话剧，既无唱工，又无做工，不必下功夫练习，就能上台去表演，自信无论何等角色都能扮演，对新剧大感兴趣”。[5]新剧除了学校的师生观赏外，学生的家长及其他人士亦会观看，“这天主学校中，每年总有这么一二次公开的演剧，招待校外人参观，当然对于当时的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于是渐渐的使上海其他的学校，在开什么学艺会、游艺会、恳亲会等的时候，也盛行拿演剧来助兴了。不过中国人办的学校中的演戏，往往不是学校当局所主张，而是学生们自己发动，要求学校当局让他们参加，作为余兴的。所演的戏，并不象那天主教学校用外国语，而是用上海土白的。”[6]

三、游欧的中国人对西方戏剧的介绍

19世纪末，中国的一些驻西方国家的使节与个别游学欧洲的文人，纷纷写作游记，介绍他们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所感，其中就谈到了他们看戏的体会。虽然这些人并非都是上海人，但他们的游记大多出版于上海，这对于喜欢接受西方文化的上海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

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剧场，因为欧式剧场与中国的戏院差异很大，故而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写道：

巴黎倭必纳，推为海内戏馆第一，……正面两层，下层大门七座，上层为散步长厅。后面楼房数十间，为优伶住处，望之如离宫别馆也。中间看楼五层，统共二千一百五十六座。[7]

王韬在《漫游随录》中介绍道：

余至法京时，适建新戏院，闳巨逾于寻常，土木之华，一时无两。计经始至今已阅四年尚未落成，则其崇大壮丽可知矣。[8]

中国的戏曲舞台上是没有布景的，一桌二椅等少数砌末而已，“景”随人现，已适应空间与时间的随意迁移的表现特性，而西方的戏剧大都有布景，这也引起了游欧人的注意。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云：

西剧之长，在画图点缀，楼台沉邃，顷刻即成。且天气阴晴，细微毕达。令观者若身历其境，疑非人间，叹观止矣。[9]

王之春在《使俄草》中，对西方戏剧的布景也有较为详细的描绘。王韬因

为既去过西欧，又去过东洋，故而他能对欧洲与日本的戏剧布景艺术进行比较，他在《扶桑游记》中说：

鱼龙曼衍，光怪陆离，则以西国胜；庐舍山水，树木舟车，无不逼真，兼以顷刻变幻，有如空中楼阁弹指即现，则以日本为长。[10]

中国人虽然喜欢戏曲，但是戏曲演员的地位并不高，在士大夫的眼里，他们是卑贱的，所谓倡、优、隶、卒，引车售浆者之流。但是外国演员的地位却是比较高的，这使他们十分惊讶，曾随李鸿章赴欧美考察的蔡尔康说，“英俗演剧者为艺士，非如中国优伶之贱，故戏园主人亦可与于冠裳之列。”[11]王韬虽可谓是一时的开明之士，对此也不能理解：“习优是中国浪子事，乃西国以学童为之，群加赞赏，莫有议其非者，是真不可解矣。”[12]

这些书籍虽然不是专题介绍西方戏剧的，但是西方世界对于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充满着好奇心的地方，任何关于西方的介绍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关于西方戏剧的描述与议论，虽然是片鳞只爪，但对于中国人认识西方的戏剧，改变传统的观念，肯定有所帮助。

“春柳社”发轫于日本，蓬勃发展则是在上海。春柳社的组织者们选择上海作为他们在中国发展新剧的起点，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上海有着新剧的观众基础，上海人对新剧有着思想的准备。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就能够对上海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在戏剧这一艺术形式上表现出鲜明的海派文化特色深刻地理解了，因为它很早就接受了西方的戏剧观念，长期孕育着新式的戏剧。

注：

[1]《瀛壖杂志》首序末题“咸丰三年岁在癸丑律中林钟之月保山蒋敦复”，次序题“同治十三年甲戌仲秋下口岭南顺德黄怀珍百拜谨序具于羊城望古轩”，三序题：“甲戌腊月上口侯官林庆铨拜识。”

[2]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年 7 月版。

[3]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第 4 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年

7 月版。

[4]朱双云《新剧史·春秋》。上海，新剧小说社 1914 年版。

[5]汪优游《我的俳優生活》。《社会月报》第 1 卷连载，1934 年。

[6]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第 8 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年 7 月版。

[7]黎庶昌《西洋杂志》479 页。长沙，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8]王韬《漫游随录》510 页。长沙，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9]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第 358 页。长沙，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10]王韬《扶桑游记》第 441 页。长沙，岳麓书社 1985 年。

[11]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 151 页。长沙，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12]王韬《漫游随录》第 141 页。长沙，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作者：同济大学，教授）